

# 中国观

2017年第7期 总第71期

# CHINA WATCH

国际视角 前沿观点 World Insight



复旦发展研究院  
FUD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  
Centre for Think-tanks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in Shanghai

内部资料  
仅供参考



# 目录 | CONTENTS

## 开闭幕式大会主旨演讲

- 01 从土耳其视角看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新形象  
*/Abdullah Gül*
- 05 人工智能时代的就业问题 */Christopher Pissarides*
- 10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亚的关系 */Temir Sariev*
- 12 新丝路带来新机遇 */György H Matolcsy*
- 15 中国智慧与 21 世纪的世界权力转移 / 黄仁伟
- 19 在后殖民时代民族国家的软实力和硬实力，以及  
中国和印度的国家发展战略 */Prasenjit Duara*
- 23 剧变中的亚洲：回首过去、立足当前、放眼未来，  
将中国、亚洲和世界打造成更加稳定的地区  
*/Rana Mitter*
- 27 特朗普之策：如何适应变动中的东亚 */Richard Bush*
- 31 中非经济纽带：发展新动力 */Arkebe Oqubay Metiku*

## 编辑部

Editorial Department

责任编辑	Responsible Editor
张怡	Zhang Yi
沈国麟	Shen Guolin
黄昊	Huang Hao
执行编辑	Executive Editor
王柯力	Wang Keli
栏目编辑	Column Editor
付宇	Fu Yu
周光俊	Zhou Guangjun
刊物设计	Art Editor
范佳秋	Fan Jiaqiu

## 中国观

CHINA WATCH

主办 | 复旦发展研究院 FDDI  
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  
CENTREMS

地址 | 复旦大学智库楼 211 室  
中国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  
Room 211, Think Tank Building,  
Fudan University  
220, Handan Road, Shanghai, China

邮箱 | [thinktank@fudan.edu.cn](mailto:thinktank@fudan.edu.cn)

电话 | 021-65645596

021-55665501

鸣谢 | 上海钰翔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从土耳其视角看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新形象

Abdullah Gül 土耳其第 11 届总统 (2007-2014)

尊敬的主持人，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很高兴组委会邀请我，给我热情的款待。每次来到中国，我都感到非常愉快，特别是来到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上海。我觉得由复旦大学主办的上海论坛主题——亚洲与世界：新动力、新格局、新秩序——非常切合实际。最近国际社会对于国际秩序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代一代的人都在讨论要建立某种形式的国际新秩序。一战之后建立的国际联盟正是这种思考的产物，为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努力。二战带给我们联合国和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我清楚地记得，上一次谈论国际新秩序是在柏林墙倒塌后的一小段时间，也就是冷战结束后的一小段时间。那段时间，空气当中出现了一点点乐观主义的倾向。但是我们普遍的思潮就是要关注每个国家在自己控制的地理范围之外所能产生的影响，比如说亚洲地区的土耳其和中国，它们都在地区以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新兴的经济体可能也对现在的国际秩序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新的挑战也带来了新的期望。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过去的三个新的所谓新格局秩序，我们也看到一些特有的模式。他们之间有些什么样的共同点？

从土耳其的角度来说，其中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战争的胜利者可以获得建立国际秩序的权利，但是一个国家能赢得战争，却不一定有能力建立一个能长时间保持稳定的国际秩序。现在的情况显示，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新的国际秩序。这是我们以及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错过的机会和责任。新兴经济体或者新兴国家绝对不能够放弃自己在塑造新国际秩序当中应该扮演的重要角色，

用具体的事例来说，我们两个国家——土耳其和中国——对 2015 年联合国大会决议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此次会议明确了向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进程当中会遇到的挑战和目标。我们希望能够以一个更加可预测的方式，在包容的基础上达成一致的意見来实现未来的标准。

另外，从其他的角度来看，我们也注意到，很多智库机构也提出了新的十项全球挑战。我们希望能够更好地应对我们所遇到的国内和国际冲突，比如：对抗恐怖主义、实现亚洲发展、改进区域治理、应对气候变化、确保发展、倡导全球中心、发展全球经济等。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要如何来应对这些正在加剧的问题？对于我们两国来说，就是要制止冲突，

促进和平与发展。中国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创始国；土耳其也与国际合作有广泛的经济交流。我们十分重视在全球化时机下找到解决地区事务的方法。在这我想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土耳其对于上海合作组织的看法。我们认为上海合作组织是亚洲一个重要和广泛的平台。土耳其已经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观察员身份，并与成员国发展了广泛的关系。作为对话的合作伙伴之一，我们希望能够在组织层面与上海合作组织开展协商合作。比如地区安全，抵抗恐怖主义，还有包括气候问题。土耳其在 2017 年总统任期内也考虑能够采取重要的行动步骤，深入参与到上海合作组织各项活动当中。

对于土耳其来说，我们认为上海合作组织并不是一个反对北约，或者说是一个反对西方的组织。我们想要和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关系并不是说要反对我们的西方合作伙伴。相反，这是为洲和洲之间的合作搭建桥梁的另一种手段。

我相信以上列出的诸多挑战超出了任何一个国家的能力，不论国家的大小，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如何。特别是我们现在遇到那么多经济的问题，气候的问题，恐怖主义的问题，还有网络安全的问题等等。

在这样子的局势下，对于土耳其和中国，或者说对于我们各自所在的各个地区来说，都要注重从源头消除这些因素。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对于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我们要继续来发挥自己的能力，更好地解决冲突问题，而且我们希望通过更多的对话方式，在更广泛的区域当中开展对话。为了对抗这种趋势，土耳其和中国都致力于在国际团体中发挥重要作用。上个十年，中国和土耳其分享了经济增长最快的两个点，这绝不是巧合。另外两国也加强了与非洲的联系，致力于消除结构上的困难。我们也帮助一些发展中国家更好的解决他们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对于我们两国来说，我们也是提供了很多技术方面协助的项目，也为很多贫穷的国家和地区捐款，同时也在各自的地区发挥了自已应有的职责。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我们两个国家来说，虽然现在有很多民众已经进入到中等收入的水平，但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并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是我们未来工作要优先考虑的。另外，我们也必须不断地考虑建设一个更有计划的，更具有弹性的社会。消除贫困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另外，在环保方面，我们积极地促进“能源篮子”的再生。但我们需要做得更多，才能贯彻落实联合国在全球气候方面的相关决议。

在经济方面，我们密切关注经济结构和社会问题。我们在促进结构建设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虽然我们不希望成为电子信息的受害者，但我们仍然想要把社会变得更加信息化、更具创新精神，这也是我一直倡导的。

全球化在不断地深化，我有以下几点要强调。对整个全球范围来说，金融活动经历了最长时间的停滞，有 17 年之久。外资急剧减少。在一系列的金融危机之后，经济的收入增长也受到了很多阻碍。高失业率、收入分配不公使得人们对全球化产生了许多不满。

但是有我们必须牢记，贸易、开放和全球合作才是加强繁荣的手段。近年来有两大实例，中国的崛起和非洲的崛起。这两件大事，是全球化 and 一体化的重要核心。所以我深信，对于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和全球的政府来说，我们必须要继续坚定不移推进全球化，而不是孤立主义。

现在很多国家遇到很多国内问题，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国内的问题其实也是受到地区和全球外界因素的影响。所以说在我们的全球发展过程当中，我们所有的政策和问题，都必须通过区域范围内，全球范围内的合作才能解决，而不是单独一个国家能够解决。中国现在不断地开放，也积极地推动全球以及地区性的合作，所以我相信中国这方面的努力能够让我们各个地区的其他国家积极参与其中，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进一步看到，欧盟，以及东欧的一些地区和国家能够共同协作，推动全球发展、框架构建和投资增长。

另外我也看到土耳其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其实在过去的几年当中不断地改善，不仅在政治层面，也在经济层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和土耳其也有很多高层互通。2009年，我在担任土耳其总统的时候，就拜访过中国，中国和土耳其的关系扩展了新的维度。我们的双边贸易在2000年才只有10亿美元的规模，现在已经达到28亿美元的规模。中国在2016年成为土耳其第二大贸易合作伙伴，同时，我们两国之间投资合作也在不断的发展。中国在土耳其也有很多基础建设，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也在不断地攀升。

一天天过去，土耳其和中国很多企业也在其他地区建立一些合资的公司。一个新的议程改变了国际贸易体系，那就是在贸易过程中均采用当地的货币，这样我们在国际贸易当中，就可以降低贸易成本。同时也减小了货币汇率的敏感度带来的影响。很高兴中国和土耳其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我们两国也是签订了双边合作协议，双方的央行也是达成了相关的合作协议，在这些区域可以看到明显的发展。

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代表团之间的互访，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在包容的基础上，在机制方面有更多的相互学习。另外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在去年，我们也是有更多的高层决议，因为我们希望未来能够更好地创新和促进可持续发展。

土耳其和中国在参与国际组织，保持友好的邻邦关系方面有同样的看法。我们希望在地区内外实现和平、稳定、共同繁荣。对于土耳其政府来说，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秉持这样互相包容的精神和其他的国家来进行合作，希望能够就地区性的安全问题开展合作。另外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欧洲安全合作组织，在东盟，在上海合作组织，还有其他的地区性组织当中发挥更多的作用。另外我们也希望能够和欧盟和北约开展相关的合作，寻找共同未来。现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得到土耳其的大力支持。

另外我还想提一点，现在土耳其有很多基础设施项目，可以通过高速公路和铁路，把中国和欧洲很好地联系起来。还有包括周边的阿塞拜疆、

格鲁吉亚，很多基础设施都是通过土耳其来进行连接。这些项目是在我2008年任期内完成的，代表了三个国家的共同利益。这是将欧洲和南亚连接起来的重要环节。

我们也遇到一些相关地区性的冲突，这些冲突必须通过国际合作和团结才能减少。我们处在非常特殊的境地，因为世界现在被划分成了许多区块，迷雾重重。在国际社会范围内，对于恐怖主义的定义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恐怖主义利用政治上的动荡和我们为市民创造的条件来开展活动。因此，为了消除恐怖主义，我们必须没有任何差别地找到所有恐怖组织。我们必须牢记，有一天这些组织可能会联合起来，这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在我做总结之前，我想要指出一点：在我们整个地区当中有很大的机遇，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现在有这样的决心能够实现更美好的未来。虽然可能我们不一定能够解决全球范围内所有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开展精诚合作。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信念，我们可以共同努力来实现新的全球秩序。我们必须共同合作才能实现我们全新的经济和政治体系，这样才能造福我们所有利益相关者。所有利益相关者必须真正合作起来，只有这样的合作，才能实现新的秩序，才能造福于所有的人，我们才能在新的世界当中实现共同繁荣。谢谢各位。

（本文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未经演讲者本人审阅）

# 人工智能时代的就业问题

Christopher Pissarides 201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我想感谢本次论坛的组委会向我发出诚挚邀请，并且就新的技术以及我们的劳动力市场未来发展趋势做一个演讲，我的专业主题大家通过介绍已经知道了，我主要是集中在商业市场搜寻摩擦理论的发现，同时我们要看一下对于长期雇佣和劳动力市场会起到什么影响，尤其更重要是看一下对于英国脱欧对于整个世界产生的潜在影响。

未来我们将进一步就欧洲一体化趋势做一些新的研究，我在发言当中，可能一方面讲到新的技术对于新的政治和经济方面改革起到的作用，这样的理论最近也是得到了大家的热捧，特别是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前沿技术的发展处于非常活跃的快车道的大背景下面，这样的讨论显得尤为必要。特别是在美国在这方面处于前列，而且美国在劳动力市场，特别是运用新的技术，尤其是在机器人理论和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处于前沿，对于未来也会产生非常深远而又积极的影响，中国在这方面显然也是处于前列，中国的政府也提出 2025 中国制造的战略目标，目的是为了在未来几十年当中进一步驱动经济快速成长和创新发展的基础当然就是创新和 AI 以及机器人和各种新的技术。

在习主席作为核心的中央政府提出这些战略之后，就引起了世界各国的热议，在我的发言当中，显然我会对机器人未来、职能人工未来做一个对比研究，特别谈到日本、韩国、OECD 国家的经验和对中国的启示。我的发言当中也会提到，中国政府和各国政府都应该采取紧急的措施进一步消弭这种经济上的不平衡和不平等，这对于解决劳动力市场有必要的价值和现实意义。我并不是一个技术的恐慌者，但是我们认为要从新的方面审视技术。

接下来我正式开始我的演讲，刚才我已经谈到，首先从经济的增长方面，尤其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新的技术，我们要实现经济的发展本身可能比较简单，但是要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新技术必须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比如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人口从农村转到城市，这是过去的一段时间，大家经常看到的趋势，但是现在不能靠这样的趋势驱动经济发展，我们需要新的技术出来。这涉及到经济行业的结构重组，我们不能期望整个经济体都能够同比广泛、全局性实现增长，这是显然不现实，也是不可能，我们必须要在可行、现实的条件下面实现某些领域的高速增长，并且驱动其他领域均衡，不同程度的增长。

讲到技术的话，显然我们这个技术从一开始是基于电子计算机的发展这个所谓结构性的调整和改革，现在尤其是在数字化的时代和数字化的改

革当中，驱动者和早先的技术突破完全不一样。比如说计算机计算化的趋势，从早期的角度来讲，它主要是和电、和大规模生产等等联系在一起，显然它也摧毁了许多没有任何需要技术水平和要求的工作。

在电被发明出来之前，在 19 世纪末和 18 世纪，都是靠蒸汽，之前靠更加原始的技术。所以当时的工作都是毫无技术可言，从 20 世纪开始，我们看到每一家家庭能够有这个能力去负担相关的电力，或者是负责相关的技术引入，在美国也是这样，在英国也是这样，在其他欧洲市场也是这样。比如说我们有更为清洁的烹饪方式，更为清洁的点燃灯的方式。特别是随着电的出现，一批电器应运而生，包括我们的空调、洗碗机、电视机等等，它们带来给世界和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对于易消耗品或者是家用电器行业带来的影响更为巨大。

随着将计算机引入市场，它所影响的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常规工作，而不是技术性较强的工作，能够做的就是一些计算。可能某些计算是需要更多的技巧或者是一些技术，但是他们都是一些日常的工作，他们不需要你更多的做一些认知方面的运算，或者是思考，因此取代性也是非常强。所以那个时候，差不多 20 世纪的晚期，应该是在一九七几年，我们发现很多工作被计算机替代的趋势，那时候的替代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替代大量的一些常规日常的工作。还有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去出差的话，要去订票、订房，这些都是很常规的工作，当时很多常规的工作，通过计算机的应运而生进行取代，对于我们劳动力市场会起到什么作用？

其实你可以看到不管是对于任何一类工作人员来说，包括一些基础工作人员来说，他们可能一开始就不用计算机，因此他们对于计算机本身运用的限制非常多，因为他们本身没有任何机会接触使用计算机，在过去的 30 多年当中，由于这批人的存在，他们没有看到自己的工资有非常实质性的增长。从整个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从底层的那些技术能力要求相对比较低的工作岗位来说，他们发展是处于停滞的状态，因为他们没有很好地和计算机进行联动，中产阶级不断的增长，因为他们使用计算机使工作效率大大提高，我们现在有新的计算机技术，使工种不断往上层迁移，因此收入水平也在不断地上升。

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的时候，由于技术分布不均衡，所以带来工资收入水平，以及技术鸿沟不平衡，政府也做了很多工作相关技能培训或者是模型重构，这些都是对于缓和社会分层有帮助，但是这个做法不知道是否在所有地方能否适用。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工资的收入水平两极分化还是非常严重。现在随着计算机技术达到一定新的发展阶段，包括人工智能，包括机器人的发展，哪些工作会处于岌岌可危被取代的工作？要被机器人取代的工作，并不是常规的工作，比如说现在讲的汽车行业，现在的汽车可能安全性要比以往得到了大大的提升，未来有很多公司都在研究无人驾驶的技术，驾驶员必须要考虑交通怎么疏导，是否会撞到人，这个路

况适不适合驾驶，现在这些东西都由人工智能进行思考，包括3D打印，本身也不是一个常规的技术，所以对于其他地方来说也是一样，一些有技术的驾驶员可能会被无人驾驶的汽车取代。

因此可以说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现在正在取代一些技术工种的工作，但是具体哪些工种影响最大，我们仍然需要统计，我们现在知道的有哪些信息？每一次出现各个技术创新的时候，都会对既有的工作岗位和工作技能以及对社会的分工格局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如果你看现在的社会格局，其实不难发现，其实有很多来自于行业以外的其他地方所谓的工种有可能会取代该工种以内既有的工作岗位，这是一个趋势。比如说我们看到家庭购车，你买任何一台车，现在40%的成本都是花在智能设备或者是电子设备，而不是硬件上面，像阿里巴巴、谷歌这些公司已经进入到一些传统领域，他们本来不是做汽车，但是他们已经抢掉很多汽车公司的饭碗，他们就是在人工智能、计算机和认知识别方面有非常深厚的研究基础和专业技术，因此他们的出现就如同一股新风潮进入到这个市场，成为很多能潜在取得既有工作岗位的新力量，但是具体哪一些行业会受到更大的伤害？我们要做一些数据上的统计。

对于我们接下来要研究的话题也是很有意思，对于我们现在的用工市场，对于用工时间会起到什么作用，会起到什么影响？显然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电器设备包括机器人设备会取代越来越多由人工所从事和操作的工作，这种取代是必然的。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我们都知道在1933年有一个学者凯恩斯做了一个非常著名的预测，从长期角度来说，我们将来的工作小时数到了充分雇佣劳动得到确保之后会进一步降到每周15个小时。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根据凯恩斯当时的判断，在人工智能参与情况是否能够得到保持。如果你看一下工作小时数，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讲，凯恩斯的论断能够站得住脚，几乎有所有劳动生产力的国家而言，每周付出的小时的确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短。在OECD过程当中，在荷兰和德国，其实他们由于新的技术运用比较多，所以他们工作时长相对较短，相对工作时长比较长的是希腊，因为他们的技术比较被动，有人称为他们的工作态度比较懒惰，因此在这方面的的工作小时数更多一点。从这张图上更加明显可以看到2014年每周工作时间和每小时工作产出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一个新的技术产生市场来说，我们不能够惧怕工作岗位的失去，但是我们要热情的拥抱工作和提升工作效率，因为它能够减少我们每周绝对意义上投入的工作时间，但是很多工作岗位用共享的方式来实现。

从工作分享角度来说，虽然德国工作小时数最低，但是每周工作小时仍然会达到26小时左右，因为他们更多是建立在分享的基础之上，德国就业率也是非常高。从新的工作岗位创建角度出发，除了工作分享之外，随着新技术不断进入我们的视野当中，而且传统意义上的工作岗位在某些

产业当中遭到重创，新的工作岗位在新的经济体当中出现也是必然，而且某些岗位也是没有办法完全实现自动化处理，因此从新的技术当中获得新的理念和体现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轻松，同时能够得到额外的需要，从而维持经济体的发展，哪个行业当中能催生出更多的工作岗位，显然不同的社会当中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个共性是健康卫生领域会有更多岗位出现，也在教育方面有更多，跟以往任何时候相比，我们教育需求是非常大的，也会带来更多工作机遇和需要。

其他还包括一些服务行业、酒店行业、房地产管理行业，以及日常服务行业包括个人服务行业，这方面也会有更多的工作岗位衍生出来。当然我们也必须要意识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比较富裕的老龄化社会的出现，这也是一个社会新的特点。特别是在健康和保健领域，我刚才已经谈到它是放在我的列表当中第一位，它会带来更多的机遇，因为我们未来社会是老龄化的社会，尤其是对于高质量老龄化社会，对于健康卫生提出的要求将会越来越多。显然对于那些有比较多可支配收入的老年人，或者是相关群体来说，休闲行业显然也会带来更多的需求，因为他们需要妥协的工作时间更少，显然人们愿意更多的把时间放在休闲和娱乐方面，当然在一些其他方面也会有更多的工作岗位出现。

健康、卫生、保健领域，尤其是看护行业当中未来的发展机遇是不可估量的。有统计数据显示，在健康医疗，尤其是在高质量看护行业方面的投入与年巨增，尤其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中，他们愿意在这方面投入资金，实现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医疗保健和看护服务提高，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关联图，中国在这张图上显然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医疗保健方面，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相对较低。因此在未来的发展潜力就会更加巨大，这个数字代表支出与 GDP 的比值。

再来看老龄化的社会，为什么会有更多的岗位出现？主要是因为整个社会正在走向老龄化，不管是欧美、美国、日本都在走向老龄化，2050 年就是非常重要的结点，几乎所有主要的经济体和区域都有老龄化人口处于巅峰的状态，走向持平或者走向一定程度的趋稳，这些所谓的老龄化社会当中供养率水平在主要经济体当中的表现是值得引起大家高度重视。比如说你可以看一下日本，老龄化速度非常快，尤其是在 60 岁以上的人口，和 20-60 岁人口比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社会当中，必须要做出更多的调整来应对 64 岁，特别是 65 岁以后老龄人口的需要，在中国显然到目前来看没有他们那么严重，我们会进入到这条绿线和这条蓝线的高位领域。无论是日本、欧洲都会出现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美国是唯一不会出现人口老龄化的国家。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感到，最上面一个点就是美国，说明美国在医疗健康的支出远远超过其他的国家，中国是在左下角的这个点。

我们现在可以比较精确的预测，在这个领域的支出会达到什么样的水

平，目前中国在医疗健康领域的投资占了 GDP 的 6%，我觉得在 2025 年这个比重会增加到 10%。我们先看一下健康领域就业占整个就业的比重，有 15%-20% 的人口是在健康领域进行就业，无论是老年管理还是儿童的护理，还是残疾人的护理都属于健康的领域，在德国的比例是 12%，中国只有 2% 人口在这个领域从事工作。如果跟土耳其进行比较的话，土耳其大概有 4% 的水平，肯定也是需要大幅增长。这里比较有趣的国家就是韩国，你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就业比例是在 6%-7%，在 2000 年，当时只有 2% 的韩国人口进入到健康领域就业，正是因为健康领域的支出不断的上升，所以这个比例从 2% 上升到 6%，相似的趋势也会出现在中国，中国政府也要做好，准备好在医疗健康领域对于就业的需求会不断的增加。

你可能觉得我已经离开了所谓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主题，但是我说的这个主题跟我刚才说的就业问题有非常广泛的关系，无论是机器人还是人工智能都是新的技术，你有了新技术，你的产业部分可能不需要再雇佣那么多人，你从这么高的劳动生产力获得更多的收益会进入到服务行业，进入到医疗健康领域，我刚才介绍过什么叫豪华、奢华的服务领域，大家希望有好的教育，好的医疗健康服务，好的儿童教育，儿童的护理，好的老年人护理等等，通过研发，通过技术，我们看到在美国、荷兰、德国，他们整个劳动人口 15% 甚至以上的领域都会进入医疗健康领域或者高端的行业，中国也会出现相似的趋势，政府要对此做好准备，有更多的以市场为驱动产业产生更多的就业需求。我们可以看到韩国已经同 2% 涨到 6%-7% 的水平，显然未来发展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本文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未经演讲者本人审阅）

#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亚的关系

Temir Sariev 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理

各位好，尊敬的朋友们，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主办方的邀请，我预祝此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当今世界动乱频频，变化剧烈，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也处于动荡之中，全人类都面临巨大的挑战。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世界上很多地区经济危机日益频繁，其不良影响的程度也越来越深；此外，对于关键资源的争夺行为也开始出现，而且呈现出跨国的趋势；另外，恐怖主义活动和毒品交易也呈现跨国趋势，但目前并没有很好的跨国方案来应对这一状况。上述问题对于地区协调管理和单独的国家治理都提出很高的要求，需要最大程度的一体化和国际合作。

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与世界潮流相逆的现象：世界上出现了民族保护主义抬头的倾向和政治孤立主义的倾向。对于发展中的小国来说，这个感觉是非常明显的。发展中的小国优势在于自由灵活度，自由是指商品、资源、技术、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通。这样的自由对于发展中的小国至关重要，生死相关。要保证这样的自由度，关键在于建立一个一体化和协同发展的机制。现在世界上有一个共识：公平的发展是人类发展的基础，公平保证了每一个国家都是世界中平等的一员。但是很遗憾的是，目前我们看到了一系列对自由的扭曲。其责任不仅仅在于发展中国家，其实世界发展秩序的机制也早就应该重新被定义了。安全是最重要的问题，它关系着全球范围内的稳定，包括政治、经济、人口、资源等方面的稳定，因此保证安全不再是单个国家的意愿和游戏，更是实现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须之举。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视世界上每种文化的独创性和每个民族的个性。在追求物质文明的同时，不能丢弃人类文明的基础。有些概念是普世的，有着确切的含义，比如公平、道德、自由、责任。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保存每个民族的多样性和特色。对于全人类来说，一个国家主导世界秩序这样的想法是没有前途的：国家之间继续对抗会加剧冲突，而且冲突会进一步恶化和深化。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在于寻找一个对所有国家都有利的双赢模式，各国政府的工作机制都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首先我们需要合作的智慧，合作的核心在于互相帮助和建立伙伴关系。我们注意到了目前世界对于资源的争夺日益激烈、冲突不断。在这种情况下，也许缓解冲突的最正确途径是找到一种更公平的方式来集约化使用现有能源，同时积极寻找替代能源。

综上所述，目前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证世界的安全和稳定，这也是全人类的要求。目前解决世界秩序和冲突的机制效率低、效果差，不能很好

的解决问题，必须推出新的顶层设计来满足每个国家发展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对于小国来说，这种做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毕竟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特别是小国可以长期独立孤立于世界其他国家而自我发展。我们注意到地方保护主义抬头的倾向，但是解决方式只有一个，就是一体化，为此我们需要全球化、跨国间的信任机制，从而形成一个可以公平讨论未来发展的平台。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创造一系列跨国、跨地区和跨种族机制，解决全人类面临的长期发展的问题。不久之前北京举办了一个高规格的论坛，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

目前我们正处于技术革命的前沿，这次革命将影响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经济、健康、教育、文创等方面。不过技术进步不应是分化世界的工具，而应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技术应当造福人类。世界发展的新形式已经迫使世界秩序在各个层次和领域开始转型，但是改变不应仅仅停留在结构上，更应该在认识上有根本性的转变，即世界新秩序的首要目标是保证各国公平发展，公平永远是第一位的。感谢各位的倾听。

（本文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未经演讲者本人审阅）

## 新丝路带来新机遇

György H Matolcsy 匈牙利央行行长、前经济部部长

各位贵宾，女士们、先生们、同事们、朋友们，首先我想说“一带一路”倡议应该会成为成为一个团结和复苏世界经济的重要倡议，同时，它也是一个来自中国的非常公平公正的商业计划，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能够连接起欧洲和亚洲的倡议。当我们谈到欧盟的时候，用一座桥梁作比的话，我们需要两个支柱。一个支柱是亚洲，那么显然另外一个支柱就在欧洲，也就是在欧盟内部。所以当我们谈到欧盟的时候，可能情况不是最好，但我们谈到政治稳定性的时候，现在欧盟内部还没有太多的政治稳定性，并且在这个背后还有一些社会不安定的迹象出现。

我发言的主要意义在于解释为什么欧洲没有能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因素，我认为其实这深深植根于欧盟的经济政策。举一个例子，我们都需要一个非常稳定的欧洲，我们都需要一个繁荣和充满活力的欧盟。讲到“一带一路”这样的倡议，我们都知道有一条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当然在古代的这条丝绸之路之外，我们还有一条新的路，从亚洲一直通过匈牙利到欧洲。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中国，来自亚洲的这些丝绸之路是如何连接到欧洲的。“一带一路”的概念就是提出这些新的连接亚洲和欧洲的路径，其实欧洲人民是非常渴望复兴欧洲，重拾欧洲梦的。

中国可能会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领导者，并且在新的机器时代，中国也会成为一个领导者。中国有一个非常智慧的战略能够帮助它在 21 世纪取得胜利，这个战略会帮助“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我们这里有很多通商之路，在中国和亚洲会建立很多通商之路，这是非常好的倡议。其实中世纪也有丝绸之路，我们其实需要非常多的丝绸之路，以便于连接欧亚大陆，欧洲和中国。

说到匈牙利，我们是欧盟内一个很小的国家。与此同时，在全球经济下，我们的话语权也没有那么强。自 2010 年以来，我们一直在不断地努力，希望能够更好地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匈牙利和希腊这两个国家都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中受到了重创。

应该说在欧盟范围内，我们可能也是受到经济冲击最严重的两个国家。但是自 2010 年以来，匈牙利和希腊都在经济政策上做了相应调整。大家可以看到从 2003 年到 2008 年我们的一些经济数据。可以知道这两个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前，整体经济状态还是非常接近的。金融危机之后，两国都受到非常大的打击，说明我们对于金融危机的敏感度也是比较大的。其实在 2010 年的时候，我们两个国家基本是处于相同的情况，但是我们选择

了两条不同的应对途径。

就希腊而言，包括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也是差不多的情况，我这边只提到希腊，因为希腊和我们更加接近。希腊，是被迫走了一条传统的，基于欧盟一体化要求的风险管理之路。但是很遗憾，希腊所采取的整个紧缩政策，最终被证明是失败的。包括希腊现在的经济，还存在很多问题。而匈牙利，选择了另外一条路。我们采取的是非传统的调整方式。我们有一些合作伙伴，有一些欧盟的朋友指责我们，还有很多国际的经济组织，也在指责我们，指责我们的这种应对方法。匈牙利采取的方法是组合方式，我们并没有采取和希腊一样的紧缩政策。

就匈牙利而言，我们采取的是在全社会分担和共享风险的方式。我们还进行了一些结构改革，最后可以看到这些措施还是很成功的。我们也是欧盟内唯一成功的国家。金融危机之后，在分享或是共担的税收制度上，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新的改革措施。我们还实施了新的财政政策，包括央行，也采取了非常具体的措施，包括监督市场。

可以看到，财政政策和宏观调控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调整。而且我们在经济，包括 GDP 增长方面也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这是我们的多管齐下，同时进行结构改革和整个税收制度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匈牙利政府，包括匈牙利央行所采取的种种不同措施。可以看到除了监督市场，还有整个税收改革和其他的一些创新以及改革措施。比如说我们采取了统一的所得税，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整个统一税率是 15%。另外企业所得税，我们也采取了 9% 的税收，同时我们大幅度压低所得税的税率。另外，我们在不断地进行市场开放，我们非常欢迎开放的“丝绸之路”。与此同时，我们在稳定物价水平还有公共项目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效。

另外，我们还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帮助我们的中小型企业更快地发展，比如说我们为中小型企业提供更多的资金。虽然匈牙利整个经济发展恢复得有些缓慢，但是已经略见成效了，毕竟我们现在整个的基础恢复增长率也才 0.9%，而且我们很多的创新措施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另外，还可以看到匈牙利和希腊这两个国家的起点是一样的，都受到金融危机的重创。就两国的历史背景上来说，相似点还是有的，而且我们在竞争方面也是很相似的。就我们两国来说，我们整个的债务，特别是外债和公共债务，都比较大。但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匈牙利采取的是结构性改革，并且是以一种独立的方式来进行调整。

事实证明，我们所采取的措施在经济发展上是行之有效的。就希腊而言，可以看到他们最后的结果和我们完全不同。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这个表格的左侧是希腊的数据，他们把税率提高了。由于采取紧缩政策，他们整个的财政支出在减少，与此同时，他们还采取了其他的经济措施，因为

他们想更好地控制整个国家的就业率等等，但是并不是那么成功。而就匈牙利而言，在税率改革的过程中，我们采取了统一的所得税，另外我们对于整个结构进行了调整，所以我们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在整个经济调整过程当中，可以看到匈牙利是自2010年起降低了税率，在之后几年里，我们继续降低税率，这样你可以看到，结果就是我们提高了就业率。同样可以看到，在这个图表当中，匈牙利和希腊的对比就非常明显。希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而且希腊有的相关政策没有在整个欧元区范围内到位。匈牙利和希腊这两国，虽然起点类似，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有很大的差异。

就匈牙利而言，我们的GDP是有所恢复的；但是我们看到希腊仍然在泥沼中挣扎。匈牙利已经偿还了外债，蓝色的部分是2010年外债的情况，现在匈牙利没有这个蓝色的，也就是已经没有外债了。而希腊，由于他们采取错误的经济政策，可以看到他们外债不断的攀升，所以从这个图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希腊的债务是不断增加的。另外，匈牙利从2011年之后，整个公共债务的比例在不断地下降。两国的经济政策完全不同，最后的差异也是一目了然。在匈牙利，我们失业率在大幅度下降。对比一下希腊，这个指标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今天演讲当中非常重要的指标。

因为其实我们所有的经济政策，在很多时候要受整个政府的宏观经济所驱动，所以从这两个经济政策，大家就可以预想到整个结局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希腊仿佛进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可以看到这两个国家即使是起点相同，但由于危机管理的应对措施不同，现在的终点也就完全不同。另外，由于匈牙利完全非传统的经济措施实现了经济的发展，匈牙利的很多经济数字都得到了很好的增长。

最后，匈牙利树立起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告诉了整个欧盟成员国，我们都能够跳脱这个困境。我们也希望作为欧洲和亚洲间的桥梁，我们能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我们希望“一带一路”能够更好地促进两个大洲之间的交流和发展。谢谢各位的聆听。

（本文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未经演讲者本人审阅）

# 中国智慧与 21 世纪的世界权力转移

黄仁伟 上海市社科院前副院长；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研究员

当今的 21 世纪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权力转移，这场权力转移不同于古代的王朝兴衰，不同于新航路发现后财富由东向西的转移，也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现在大家都把目光都对准了中国，认为中国是这场权力转移的主角，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国会不会在这场权力转移中重蹈历史的覆辙、甚至重演历史的悲剧。很多人认为没有答案，也有一些人已经认定中国会走德国、日本、苏联的老路。但我今天可以明确地回答各位：中国不会走别人的老路，因为我们有中国智慧，它可以让中国乃至世界避免历史悲剧。

这里我以“一带一路”为例进行说明。其实权力转移不只是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的转移，而最终是思想、观念、制度等软实力方面的权力转移。这种权力转移更加深刻，同时也非常艰难。其实在中国智慧中，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软实力的权力转移。

首先我们从中国的历史经验来看：“一带一路”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早就有，一个是万里长城，一个是南北大运河。万里长城是中国古老的军事防御基础设施，南北大运河是中国古老的交通基础设施，这两大基础设施实际上确定了中国几千年领土版图的结构。中国人了不起，2000 年前就能建造这么伟大的工程。

“一带一路”是当代世界最伟大的工程之一，它和中国历史上的基础设施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把当时整个中国用这两样东西打通了。现在我们用“一带一路”把整个世界打通，它要影响世界以后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但是这么大的工程，其实在中国用一句很简单的话就揭示了，叫做“要想富先修路”。一个国家、一个村庄要想富都要先修路，基础设施是发展的先决条件。

实际上中国在最近的 20 年时间里，经历了一场基础设施的革命。2000 年以来，大概将近 15 年的时间，中国基本上完成了全国范围的基础设施网络建设：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远距离速变电、无线电的通信、港口、机场、全球定位系统，全套立体的基础设施网络在 15 年的时间里面完成了。由于中国基础设施网络的完成，才有可能建立一个亚洲的基础设施，否则你说从蒙古到越南怎么走，哈萨克斯坦到东南亚怎么走。如果亚洲的基础设施网络能够建成，欧亚大陆基础设施网络也可以建成。我们中国用了 15 年时间完成了这个网络，在整个欧亚大陆范围内大概要 3 倍的时间，差不多 40 年到 50 年时间实现欧亚大陆以至全球的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所以这么一句话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要想富，先修路。

第二点，中国的文化是一种中庸之道，也就是说采取渐进的方法来实现巨大的战略目标。“一带一路”这么大一个40年到50年的工程只能在一个一个具体的项目中实现，而绝不是在三、五年内就可以完成的。所以很多国家，包括我们国内的很多朋友都以为我们在两、三年里面就可以完成“一带一路”，这完全是做梦。但是你如果了解中国渐进主义的思想方法，就可以想到这样一个大工程可以完成。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都是走的渐进式道路，最大、最困难的任务都是用渐进的方法来完成，而且中国的文化也是这样：量力而行，而且不主张一家包打天下。

所以我们现在“一带一路”早期项目实际上都是同这个国家具体的工程结合。但是随着“一带一路”项目越来越多地落地，它就会连成片、连成线、最后连成网。所以中国在“一带一路”中，一定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现在有几个重点地区，我们就可以看到有所为：中巴走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到万隆的高铁、还有哈萨克斯坦的工程，这些大项目已经落地了。它们在“一带一路”中虽然只是一个局部，但是已经给我们带来一种模式：就是“一带一路”和当地项目的结合，这是“一带一路”成功的路径。

“一带一路”还会引起很多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国际上感到的变化。大家很担心中国会不会用“一带一路”强迫谁做什么。从这一点上，要了解中国人际关系的哲学讲究的是两相情愿，就是说双方都自愿做这个事。所以“一带一路”的所有项目一定是双方、或者三方、甚至于四方互相情愿的事情，有一方不情愿，我们也不会做。所以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带一路”不是政治工具，它完全是和当地发展结合的社会经济项目。所以人际关系的哲学，在“一带一路”里面是用的非常普遍。

第四个就是要了解中国的秩序在“一带一路”当中怎么表现、对于现在的国际秩序将会发生什么样的纠偏作用。中国的秩序观其实有两个核心概念，就是仁政和王道。在中国的政治哲学当中，王道和仁政是两个正面的概念，暴政和霸道是两个负面的概念。中国在“一带一路”中一定会建立一种能够被别的国家接受的秩序。现在世界都在讲全球治理，全球治理有多种模式，或者多种理念。但是西方的全球治理就是要求各国接受西方的治理模式，这是一个前提条件，如果你不接受西方的治理方式或者是普世价值，那么你就不能在全球治理中取得合法性，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但是中国的“一带一路”不设这种政治前提，没有这样的政治先决条件。

“一带一路”同当地的制度、文化结合，以当地的制度和文化为主体，而不是用“一带一路”改变当地的制度和文化，这是我们的一种秩序观。当然“一带一路”还会遇到很多风险，所以中国政治当中还有一种概念叫“由乱而治”，“一带一路”的治理要和当地国家治理结合。安全风险、政治风险、文化风险、生态风险等等，我们不是看不到。很多人说，“你以为‘一带一路’好弄吗？”的确，风险很多，我们现在天天在研究“一带一路”

的风险，但是所有这些风险都是要靠当地的国家和人民参与治理，而不是单单用中国的力量，我帮你把这些都包下来。

比如说打击恐怖主义，这是某一个地区共同的任务，像中巴走廊肯定会遇到恐怖主义的风险，但是我们在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和巴基斯坦合作，控制这一带恐怖主义的风险，和巴基斯坦合作打击了恐怖主义，推进了一个重要环节。我们讲的中国秩序观，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对当代秩序纠偏。“一带一路”又是一个包容、开放、多样性的发展过程，这个包容、多样性、开放的过程，在“一带一路”里面必须贯穿始终。中国文化本身就是多样性的文化，世界上所有大国里面，中国文化的多样性是历史最悠久的，它是儒、道、士结合，所以中国并不排斥任何文化，对任何文化我们都是接受的，这是我们从历史上延续至今的状态。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就是这种状态。虽然中国的确有延续很久的专制制度，但是中国文化的多样性是在兼容并蓄当中建立起来的。所以有融乃大，这是中国文化的特征，我们在“一带一路”中同样要体现这种文化。

第六就是中国的天下观，这个经常被人家贬低，说中国思想非常狭隘，中国人认为中国是中心、四周都是环绕中国的、天下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过去确实是这样，但天下观实际上指的是现代的中国要以世界、以人类为己任，这个“天下”超越了西方的地缘政治、超越了势力范围、超越了盟国体系这样的旧政治空间概念。所以这个天下观在现代的条件下变得先进了，比盟国体系、势力范围要先进很多。所以我们通过“一带一路”把天下观这样一种空间概念变成了具体的，比如说利益结合点、网络的枢纽点、金融的中心、文化的中心、产业的梯度转移、资源的合理配置等等，在天下观的空间里面都可以出现。如果用势力范围、用盟国体系、用地缘政治，这些都不可能做到。

中国的利益观也是超越西方以我为主的狭隘利益观，中国欲取之必先予之，你想要东西的话一定要先给人家。对于最穷的人，我们只给不取；对于比较穷的人，我们多给少取；对于差不多发展水平的，我们可以先给后取。这都是益在前，利在后。所以“一带一路”不是施舍，不是说我只援助、不需要你偿还。“一带一路”其实是用市场的方式运行，但是在运行中，我们讲益再讲利。所以不能搞以前的那种无偿援助，“一带一路”要可持续的话，必须益在前，利在后，益和利并行。

第八，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在各种关系的处理中有一套中国的战略文化，从春秋战国就开始形成一种纵横捭阖的战略文化。中国战略文化非常丰富，比如说《三国演义》，现在我们讲战略大三角、战略小三角时，都在沿用《三国演义》当中的概念。中国的古文化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果要少犯一些战略错误，就需要理解中国的战略文化。

“一带一路”还要处理好邻国和民族关系这样的一些复杂问题。在中国历史上，这方面的经验也是非常多。可以说整个丝绸之路，不管是路上、

海上，都是中国古代先驱们用古代外交手段、经济手段、文化手段开辟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大的外交家，国际活动家都是在丝绸之路上产生的：张骞、玄奘、王昭君、郑和等等。所以中国非常善于处理周边和少数民族关系。

最后，中国的智慧就是和平与战争的辩证关系。《孙子兵法》里充满这方面的智慧：攻城为下，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善之善智也，等等。但是最重要一条就是：能不用兵，就不用兵。这样的思想贯穿中国战略的指导思想，到现在为止，我们防御战略还是这样。所以“智慧”的“智”也是“知道”的“知”，知道就是知己知彼。我们建设“一带一路”的同时，一定要知道各国的想法，也需要各国知道中国的想法。在这个互相知道的情况下，中国就产生一种超越国家、超越历史、超越意识形态的智慧，中国就不会重蹈覆辙，世界也不会再次经历 20 世纪的世界大战和冷战，这就是我们对世界权力转移的中国答案，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未经演讲者本人审阅）

# 在后殖民时代民族国家的软实力和硬实力， 以及中国和印度的国家发展战略

Prasenjit Duara 杜克大学历史学系讲座教授

我发言的主题，是在后殖民时代民族国家的软实力和硬实力，以及中国和印度的国家发展战略。

这是一个为公共知识分子提供讨论机会的平台，而我作为研究国际关系的知识分子，需要做很多的拓展，同时也必须要坚守一定的学术性。

我感兴趣的话题，是无论中国还是印度，在他们实现民族独立及其他国家发展的时候，都受到了很多后殖民时代的崇高思想的启发。而在这之后，历经数年，现在的状况又是如何？我认为，有一些理想已经得到了实现，而还有许多却已经被颠覆。其实，许多后殖民时代的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对于历史正义的理想，和之前帝国主义统治的时代不一样。其中任何一个国家，也都不缺乏从光辉历史中吸取经验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对于新亚洲的文化秩序，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要探究的问题是，一个民族国家在竞争体制当中的国民意识和民族国家的要求，如何成为对于文化起到重要作用的外力，以及文化实力如何得到拓展。

我发言的第一部分会谈到，基于我们的这种历史语境和概念语境，如何更好地理解两个因素：一个是理想主义，一个是现实政治主义。同时我会审视一下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以及他们如何变迁成国家的软实力。第二部分则会讨论中印能否基于这样的理念发展新观念。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文化帝国主义和帝国地区主义的这个问题。传统的文化帝国主义远近闻名，但是大概没有人能像奈保尔一样，简明概括出19世纪的文化特点：欧洲人希望既能得到财富和奴隶，又铸造出一些雕塑，让别人觉得他们对世界文明做了贡献。这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一个巨大成功。一战结束之后，这种残忍的帝国主义和威尔逊理念大行其道，民族国家不断抬头且希望实现自治。十月革命后，这种想法不再是主流，德国、俄国、美国、日本等后进者都在不断改变帝国主义的现实和意识形态。

每一个所谓的大国，都希望能够建立起帝国主义的区域集团。这些大国在区域中，希望能够用这种整合的民族模式统治社会。20世纪的战争期间，帝国主义集团的形成是帝国主义优势表达的新阶段。这些集团有统一的货币、标准和机制。同时也建立起代理政权、一些傀儡政府，还有一些被动员起来的组织。另外，他们还可以通过银行、基础设施来实现统治，但最终，还是军事决定一切。

与此同时，在对兄弟关系的修饰上也有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在东亚，我们称之为哥哥和弟弟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帝国朝贡体系。前苏联时期，

中国就对这种所谓兄弟情谊有过一段时间的拒绝，所以出现了当时的历史境遇。这种所谓的自治，或者说是民族主义的抬头，成为了我们所谓新形态的、对共同血液和文化的忠诚。但是在现实当中，这种统治得以传递和延续，这就是一种新的文化制度的安排。

这些新的大国，希望能够把这些被剥削的地区逐渐整合起来，作为他们共同区域的部分。他们的统治理念，是通过新帝国主义的实力，又根据新的民族国家和发展主义的思想来进行建模，虽然当时的发展水平在不同国家的阶段和程度是不一样的。这就使得那些老牌的大国感到不太高兴。比如说，英国就建立起一个叫做英镑的集团，制造了各种各样的国家以外的殖民地区，地方自治政府等。新法国人对于殖民主义的态度，能很好的通过艾伯特的观点体现，其目的即是，团结所有远近地域当中所有法国人的存在，以能在这些地域中获得优势。英国和法国并不是非常成功，德国在这方面可能是处于中间，日本在建立起一个共同统一的帝国地区主义集团方面，则是非常先进的。尤其在东亚地区和南亚地区，日本对于帝国主义的叙事方式，同样也在改变这些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而我们也看到，由于环境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对于帝国主义者来说，更为有效的方式是建立起一种现代和间接控制的机制，对他们的宗主国和附庸国采用全新的理念。其目的是为了对这些地方实现更好的控制。其方法是不断地加强对于相关资源和要素的动员，比如说银行、交通、基础设施、政治机制。

在冷战期间，世界两极在互动当中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体系。军事集团、军事大国和经济控制则在背后施加作用，这种作用非常现实。当时建立起了一些所谓的自由世界和社会主义联盟，以及和其他联盟进行对立的机制，以实现相关资源的动员。这些资源的动员工作也建立起大城市中的利益集团，比如说商会、俱乐部、共产主义团体之间的紧密关系。同时，还有很多文化的转型，也通过这些文化机制和产业得到了复兴，比如说好莱坞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及，通过一些出版物和其他宣传意识形态的方式，增强软实力。当然，这种所谓的启蒙主义的设计和思想，也在超级大国当中通过所谓的亲情主义和国民主义的抬头得以强化。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很多其他地方，都看到这样的趋势。我们可以把国家帝国主义，看成是在文化帝国主义和软实力之间，能够占据一席之地的想法。

其实所谓的文化帝国主义，就是一种所谓的欠发达地区或者是被殖民国家的文化意识抬头。软实力，则更加强调当代国家影响力的竞争在全球化时代的体现。理想情况下，国家帝国主义拥有文化帝国主义的要素，即经济、军事控制、软实力、维持公平性的叙事方式及机构、精英的拥护等等。

约瑟夫·奈对于软实力的描述其实非常模糊。他把软实力定义为希望获得某一个国家获得发展的结果，就是要说服别人，不是威胁别人。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相比于约瑟夫·奈很多其他观点、和相比于很多其他人对于软实力的定义，更有说服力的定义。

当然，具有优越性和被别人羡慕之间，可能是存在的某种因果关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接收国就希望在文化上获得具有优越性国家政治上的结果，或者政治上的安排。接收国可能会去接收别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但是并不意味着会需要别国政治发展的结果。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军事入侵和占领发生之后，通过软性的说服，使得征服地的人民接受征服国的文化、经济、政治制度安排，是通常的一种做法。

回到我们的主题，中国和印度的情况。其实在冷战期间，中国和印度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位置，在冷战秩序当中，中国和印度没有很好的融入进去。即使在 50 年代，你也不能纯粹把中国看成是苏联的小弟。这两个国家保持相当的独立自主，而且他们积极参与从 1947 年会议就提出的不结盟主义的运动。他们希望能够创造出一种新的政治秩序，但是这种新的政治秩序愿景，其实在 1950 年没有受到太多的重视。为什么不结盟运动没有取得成功？因为在冷战期间，两个非常大的集团（而且其中的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实体的地域范围）之间充满了竞争。

于是我们就出来一个新理念，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关注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竞争和竞争关系，目标则是，希望能够执行一种不对其他国家进行干预的政策，并且，把一些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放到一边，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两个相互竞争甚至敌对的国家之间，仍然建立某种神奇的联系。通过万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展现出了对于和平而不是革命和战争的渴望。但其实中国的领导人对于在世界革命当中，扮演一个领导的角色也是比较感兴趣的。中国其实一直在给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提供武装的支持，以便能够支持那边的革命运动，这种做法也一直持续到了 80 年代。中国实行了一种我们可以成为两条腿走的政策，一方面是一种不对其他国家进行干预的国与国关系政策，另一方面则是在党和党的关系上的对革命运动支持。中国在 21 世纪重新成为了一个超级大国，而一些历史记忆则被作为发射台。

中国对于亚洲的这种整合力，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得到很大的提升，因为人民币没有贬值，中国获得了其他亚洲国家的信任。同时，中国也是最早跟东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这也刺激了其他国家纷纷加入到了这样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当中。

我之所以现在还没有谈到印度也是有理由的，印度能做些什么？尼赫鲁对于印度的世界地位是什么样的看法？拥有各种文化的联动的亚洲正逐渐变得更加稳定，这也会成为一种亚洲启蒙的新开端。印度是希望在亚洲能够有更多民主化的国家。

15 年前一本关于中国和印度的书，预言印度不可能成为南亚的主要力量，深陷于国家建设的各种问题的同时，将附属于中国建立的世界秩序。然而印度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随着地缘政治的飞速变化，印度也有在美国、日本和东南亚那里寻找到新的联盟关系。同时，印度也是在两条腿走路，

一方面，印度在不断强化军事力量以维护自己的权益，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在新传统软实力概念下进行合作。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也希望扩张软实力，而不仅仅是靠军事实力扩张。中国可以像五十年前的美国一样，充分利用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建立自己的秩序。特朗普成为了美国总统，可能为中国能带来消除美国影响、确立自己秩序的机会。

我们能不能真的期待中国的和平崛起？我觉得可能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继续两条腿走路，第二种就是更多的关注经济外交和软实力。软实力就像我所说的，其实是植根于硬实力之上的，因为软实力意味着要让别的国家羡慕、并希望能够也成为这样的国家。军事实力的展示，则会更多以代理战争的形式体现出来。而无论国家的力量是怎么展示，中国这种软实力可能会体现在更多民族参与，比如说湄公河治理委员会的建立等等。湄公河的活动确实延缓了中国在澜沧建大坝的速度和进程。中国同样也应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起到领导作用，不仅仅是技术手段上，还有创造一种社区参与的框架结构。

谢谢。

（本文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未经演讲者本人审阅）

# 剧变中的亚洲：回首过去、立足当前、放眼未来， 将中国、亚洲和世界打造成更加稳定的地区

Rana Mitter 牛津大学中国中心主任

今天我想花 20 分钟左右的时间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今天讨论主题的背景，就是过去，现在和将来如何融合到一起，为亚洲，乃至世界塑造一个更加稳定的中国和亚洲。

我这里特别要讲讲对于历史的解读，其实 Duara 教授说的话跟我要说的有一定的关联，因为他说的军事力量、政治力量，都有助于塑造国家和地区的自我认同意识。我还要增加一个要素，就是两个历史片段，都跟中国的关系，但不仅限于中国。一个就是有关丝绸之路，现在大家都很熟悉，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概念被提出来以后，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们看一下现代历史，尤其是在二战以后的历史，抗日战争以后的这段历史，特别是作为重要战场的亚洲，尤其是在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各国角逐当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所谓的新丝绸之路和新的海上丝绸之路和中国政府所提出来的“一带一路”政策倡议之间的关系。它的确提供了一个全新政治和贸易机会，不仅对于中国，也对于那些通过这条带和路，与中国结合在一起的国家。

我觉得值得大家关注的是，从某种角度来讲，可以通过这段历史，唤醒大家对于这片热点地区的关注。对于整个 20 世纪来说，其实大家的关注点都是在太平洋地区，集中在亚太地区。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要认识到，需要把更多的经济、贸易等重心放在中亚，包括南亚、东亚等地区，又使我们想到在唐朝，丝绸之路刚刚被建立起来的盛景。当时中国政府有一些愿景，向西部拓展的现实也已经通过丝绸之路得到强化和巩固。因此当时的首都长安，就是现在的西安，成为很多贵族或者是商人聚集之地，包括中亚、南亚和欧洲以及中东地区。许多的商人把当时的奇珍异宝，包括非常精美的丝织品和商品，带来展示和交流，这使我们想到过去的盛世。

因此我们很有可能看到一副不同于闭关自守或者是固步自封的景象，而之前的道家、儒家都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思想的基础。正像一些专家所谈到的一样，我们中国思想极其深刻地影响了东亚和东南亚，包括日本、韩国和越南。非常重要的一直是直到 19 世纪，所谓中国圈或者汉文化圈，一直是一种混合型的文化圈，混合杂糅了许多国家和许多来源的文化，包括儒、道、释。它们可能来自于印度，可能来自其他民族国家，或者是来自其他的少数民族，来自当时的秦朝、清朝，以及来自不同类型的组织的互动。

中国文化，中国概念的理解一直是属于多元化，从来都没有单一的精

确的定义。因此我觉得中国应该叙述中国故事。我一直告诉大家其实没有一个精确的所谓中国故事，有很多人一直在反对或者是在争论：到底有没有一个中国故事。我觉得没有统一的中国故事，我们讲的就是以中国为主，混杂了许多因素的综合故事。同时我觉得印度当时的活动最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如何更好的与周边的一些变革以及非欧洲所统治的区域互动，刚才 Duara 先生也提到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如何有效地形成许多非欧洲团体当中的群体，形成 20 世纪的民族思想和理念。

而和它相关的一点，这一点也和软实力有关系，就是所谓的综合性，或者说来源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印度当初就在亚洲现代性方面处于前列，你可以看一下印度的民间艺术表现形式，不管是音乐还是绘画。当时这些绘画仍然可以看出非常鲜明的现代主义特色，而非一味追随历史主义和传统主义以及经典主义的特色，这也极其鲜明地定义 20 世纪初的民族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特点。这些现代主义的元素来自于相当多的非欧洲团体和地区，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因为我觉得就像印度的故事也不只是印度的，中国的故事也不只是中国的。

我最喜欢举中国诗人郭沫若的例子。20 世纪早期的时候，中国的伟大诗人郭沫若曾经写过天狗，这里面包含很多现代性元素，里面的诗句是这样的：我是月的光，我是日的光，我是一切星球的光，我是 X 光线的光，我是全宇宙的 Energy（能量）的总量。它说明了什么？它让我们感受到了 19 世纪美国现代主义的诗人霍德·惠特曼的特色。在现代主义兴起的过程中有一些动力因素，当时亚洲和美国的文化符号和人物大规模进入亚洲语境当中，包括来自于日本的文化元素，从郭沫若的诗就可以看到这种元素，中国、美国、印度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体现了杂糅性、兼容性、大都市的包容性。

在中国大历史的关照下，你可以看到中国并不是一直在闭关锁国，而这也体现在战争时期，特别是二战时期，二战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这张图就展示了当时中国一些地方遭受日本的入侵之后，发生的一些故事。这张照片记录了日本进行空袭之后的重庆。当时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中国人，还有很多外国人共同合作来做一些事情。我们都知道当时重庆作为陪都，也遭到了日本的轰炸。虽然只是一场战争，但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现在中国为什么会成为世界大国？有一部分源于在当时战争中的成长。中国当时与很多主权国家结盟抵抗法西斯。这并不是一个巧合。到了 1943 年的时候，差不多在 1842 年签署的南京条约 100 年之后，中国签署了新条约，这个新条约承认中国是一个完整的主权国家。自从那个时刻开始，中国不断向外拓展，签署协议，形成很多盟友关系，包括中美关系。中国和美国作为两个大国，形成盟友关系。

其实历史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线性。我们都知道美国曾经就很早派出他们的代表拜访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共元老，在 1944 年，当时党中央还

在延安的时候，我们看到美国派出中国小组和中国高层领导人接触和见面。可以看出在亚洲语境下，两个大国的代表之间已经有了互动，同时在一个反帝反殖民的初期，中共与美国也有接触。

同一时间，更多的接触是来自于国民政府。当时的政府是由蒋介石领导的，他和他的夫人宋美龄女士与美国当时在东亚地区的统帅史迪威将军进行了会面，还拍了合照。这张照片三个人都在微笑，虽然两方有矛盾，但显然，他们面对记者照相机时不会把这种不满展现出来。至少大家从这些交往可以看到，二战起到很微妙的作用。一方面珍珠港事件之后国际力量重塑，英国、美国和中国在抗日战争当中达成一致，这也是第一次一个非欧洲的强国和另外一个非欧洲国家结成同盟关系。这当然是国家利益起到作用，但这并不常见。

在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英国和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站在一起。当然印度也有同样的表现，也实现了自己国家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这张照片展现了中美关系的多样性。当时的史迪威将军，罗斯福总统，是如何跟蒋介石政府交往，进而产生了不同的想法，他们认为中国的合作意愿不是特别强烈，而中国方面认为美国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支持，抵抗外敌入侵。在1943年举行的开罗会议的也是许多中国政治研究专家研究的一个主题。虽然会议没有做出任何的重要决定，但这是第一次非欧洲国家领导人站在第一排合影。这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到有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宋美龄，所有这些都坐在一起，重要性不应该被低估，它标志着亚洲关系的转变，尤其是后殖民主义时代关系的转变，也带来一系列的战后国际秩序的改变。

我很简单地来谈一下战后的情况，值得注意，在过去几十年当中，我们看到中国和世界拥有很多发展的机会，但是也失去很多机会。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机会有很多，中国和亚洲之间能够建立起全新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和当初的殖民时期关系完全不一样，1955年万隆会议就是非常典型的代表，大家可以看这张照片是中国的周恩来总理和印度的尼赫鲁在一起开会的时候所留的照片。他们开始建立起互信，当时都认为美国和中国完全可以成为当时塑造世界秩序的两极，但是显然没有进一步发展，也就是我之前所提到的，失去了发展机会。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和中国渐行渐远，开始成为互相孤立的两极，双方需要为此局面的形成负责任。这个历史机遇如果被抓住的话，结果将完全不一样。两方都要为自己的政策和外交的失误付出一定的代价和责任。直到尼克松和基辛格在70年代访问中国，见了当时的领导人之后，中美关系才迎来了转机。

当然在苏联解体后，中国有了新的发展机遇。过去几十年当中，中国的影响力在与日俱增，10年前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再一次彰显了中国的地位和特色，用体育作为一个纽带，在国际舞台体现文化软实力。网络的兴起也是改变中国人世界观的因素。在中国待的三天，让我意识到我落伍

了，大家都在教我用微信。中国显然在网络、APP、IT 方面处于世界的前沿，将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放在第一位。中国的网民数量已经超过美国的总人口。同时中国也不是没有问题。中国有很多发展机遇，但是有很多挑战，比如说环境污染。为什么特朗普总统对巴黎气候协定的态度十分暧昧？或者仍然不愿意在这方面的表态。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解决污染的问题上，各国诉求和考虑显然是有所不同。中国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应对这样的挑战，积极提升国际影响力。

我们现在所谈到的是贸易、商务合作，而不是自力更生，独立自主，不靠外国，和以前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是在复兴一个古老丝绸之路，与此同时又能够看到，在过去 10-15 年当中，尤其是 2015 年二战结束 60 周年重要的历史时刻，我们看到国庆阅兵的盛况，使我们想到当年二战时期，中国、美国和英国在一起联手打击帝国主义或者说是外敌入侵的情景。

我们应该从这样的一种共同拥有的历史找到复兴的实力和线索，应该加强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这将成为一个加强各自理解的叙事方式。尤其现在看到欧洲，英国脱欧，还有其他的事件愈演愈烈，对于中国来说，我们显然应该正确对待国际合作，国际合作也应该是由国家实力作依托。

在我结束讲话之前，我想留给大家一张图片，这张图片也使我们想到当初毛泽东总统和尼克松总统见面，现在又看到中美两位领导人一起握手，习主席和特朗普的微笑说明很多东西。但是我们更加重视的是后面可能会发生什么，未来四、五年世界秩序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中国和美国显然通过一系列的合作和抗衡实现各自国家实力的提升。但是我们又需要注意我们必须要从历史中找到相关的力量补给，不管是对于中国还是美国，尤其是对于美国来讲，双方都应该一方面看到两国做的贡献，同时要看到各自做出的牺牲。二战的胜利让现在的中美两国对战后的亚洲有主要的发言权。

很难想象如果中美不进行合作的话，亚太地区能够取得和平，但是关键的一点就是两个大国都需要有所平衡。中国应该继续欢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存在，而美国应该将中国带入到塑造这一地区合作圈里面。有了这样一种合作，那么“一带一路”的战略取得成功的概率就会更高，从欧洲的角度来说，我生活在欧洲，我们也非常乐意看到这两个重量级的国家能够走到一起，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为亚洲和世界各地带来和平和稳定，谢谢。

（本文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未经演讲者本人审阅）

# 特朗普之策：如何适应变动中的东亚

Richard Bush 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非常感谢陈教授，我很高兴来到上海。坦率地说我生活在一个后现代地狱，也就是华盛顿特区。在那里，大家对特朗普的情况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并试图解构特朗普的行为。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样的一次国际论坛，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聚集在一起，讨论对世界未来有深远影响的一系列事项。我要特别感谢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和复旦大学，感谢你们的邀请，我很荣幸能够参与到这样的会议中。

我的父亲原来在东亚做过传教士，所以他也为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做出过贡献。对于 Rana Mitter 教授的发言我有很多不同的评价角度，但我今天要阐述的主题是当下特朗普对于亚洲政策的矛盾之处。他确实体现了美国如何利用其战后对世界和东亚的战略，并根据新情况进行调整。我认为特朗普政府可能是美国现代历史中最奇怪的政权，但现在要说特朗普的亚洲政策是什么仍然太早，更不要说这些政策会产生什么影响。

当我们谈到世界政策的时候，一定会想到一项政策中包含的以下元素：一系列基本原则，基本的利益和价值，基本的目标、战略、策略，还有执行的方法、绩效表现、考核。这些因素会在某些角度相互联系，毫无疑问，没有一届任何美国政府能够在所有方面达到成功，但他们都尝试去做了。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对于对外政策的看法非常不同，他冲动却缺乏一致性，他表达了退出 TPP 的愿望，却从来不对背景、后果以及执行 TPP 的困难进行讨论。他全然无视事实和专家知识，一心提高人们的期望，并煽动恐惧。

我的一位朋友对过去 30 多年来特朗普的观点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特朗普既是一个重商主义者，又是一个孤立主义者。其实二战以后，美国总统都相信美国需要自由贸易，同时应积极参与世界事务。特朗普其实持杰弗逊主义思想，但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详细阐述。杰弗逊的主要观点是，精英是糟糕的，精英必须受到挑战、必须被消灭。

下面我们谈一谈特朗普政策流程的内容和元素。我们知道在二战之后，美国已经建立起大部分政策制定的流程，以确保在政策制定的过程当中，相关政府机构能够共同制定相关政策并有效执行，政策制定的基础就是各个机构的经验、知识和责任。我们有适当的机制来确保在政策制定过程当中，不同的机构必须要进行互动和合作。我们不能说这样产生的结果一定会是好的。总体来说，虽然好的流程并不一定会保证好的结果，但是一个糟糕的流程几乎一定会产生糟糕的结果。之所以要建立这样的政策制定流程，主要就是为了控制总统本人的行动。二战期间，罗斯福总统办公室曾

主导过一个非常混乱的政策流程，当时的国家安全领导者并不希望这样的流程继续实行下去。如今，特朗普总统非常不愿意受到各个政府部门的限制，从某种角度来说，已有的机制已经被破坏掉。在制定某些政策时我们会应用这套机制，其他情况下却不予采用，所以现在我们无法得知每件具体的事项是否应用了该机制。当政府绕过机制行动时，政策内容一定会受到影响，更为严重的是一直较为稳定、变化缓慢的美国国家利益也会被忽视，甚至被破坏。

如果你只根据美国总统或其他机构的口头表达来判断美国政策，结果不一定准确，因为机制没有在其中起到作用。我们知道特朗普持孤立主义和重商主义，他对美国的看法可能和二战后美国的安全战略完全不一致。美国的安全政策是在欧亚大陆两端均部署自己的军事力量，同时积极推动世界范围内和亚太地区的经济关系架构，鼓励良好的治理，我称其为“综合前沿军事力量部署”。前沿部署军事力量可以保证美国在需要的时候进行战争，同时也向我们的敌人和盟友给出明显的信号，就像警察一样，美国力量在东亚地区的存在的确为其带来了相对区域稳定，当然越南战争是一个例外。

在美国政策背后还存在着很多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但前沿军事部署是关键。不论特朗普如何认为，美国领导人相信，帮助我们的朋友获得安全的环境也是保证我们自己国家的安全。不论特朗普如何认为，建立这样一个全球和地区性的经济架构也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能够帮助我们的友好国家实现繁荣和富强，增加整个集团的竞争力。其实美国领导的安全架构并不是完全静止的，也会出现巨大的变化，比如尼克松和吉米卡特在 70 年代开始和中国接触，使中国走出孤立状态。这其实要求美国加强自己的基础战略，促进整片区域内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实现更多接触，加快经济发展，并在某些情况下加快向民主的转变。1991 年苏联崩溃改变了整个亚洲的安全环境，一些美国的安全盟友更紧密地团结在美国的周围。

从这个历史角度来说，奥巴马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其实并不是新的策略，而是老策略在中国正在崛起成为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这样一个新环境下重新调整的结果。但是这绝对不是一个遏制政策。我想说特朗普带入白宫的政策是很不一样的，他公开质疑美国的盟友以及全球经济贸易的体系，并认为无论在安全事务还是贸易方面，美国都遭受着不公正的待遇。我个人认为他对于美国在军事联盟和经济领域所遭受不平等的指责，暴露了其对过往安全政策细节的无知。同时，特朗普可能高估了中国对于平壤的影响力。我们都知道他在当选后不久时提到过，“一中政策”不是中美关系的基石，可以对其进行谈判。

现在让我们看看 1 月 20 日后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特朗普上任之后很快就做了出一些改变，首先是一些高级官员重申了对日本和韩国的防卫承诺，这种防务成本主要由北约承担，而不针对韩日。其次美国重申了对

于日本的安保政策，安倍晋三也是特朗普上任之后会见的第一位外国元首。同时特朗普认为，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是一项重要基石。特朗普也开始接触中国，向习近平主席表示美国会尊重一个中国政策，但与此同时，他又重申了对台湾的长期政策。最终，特朗普和习近平主席在峰会上的谈话奠定了中美关系的基调。目前为止我们听到的都是各种各样的说法，但说法可以改变，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些初步举措会对长期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在我看来，特朗普可能不太喜欢多边贸易架构，特别是 TPP 的架构。其实在我看来 TPP 对于美国来说是非常有好处的，美国退出 TPP 确实会让我们的亚洲盟友对战略关系产生疑问。特朗普政府可能更为关心对现有贸易政策和贸易协定的执行。短期来说，特朗普经济团队内部也会出现相互矛盾的政策。我们都认为在美国与各个国家的经济关系当中，合适的双边经济关系应该为双方均带来好处。如果美中之间的贸易是不对称的，两国可能需要进行政策调整，以确保双赢的结果。但特朗普政府对于国际关系的想法可能有一些缺陷，他似乎不太理解，其实所有标签为“中国制造”的产品，其价值都留在创造产品的中国。而且很多美国进口产品在中国或其他亚洲国家的增值其实非常高，所以美国的贸易数据有很大的误导性。

在我看来，政府公开的贸易逆差不应该成为我们制定贸易政策的基础。在我看来特朗普根本没有搞清楚美国经济出现问题的原因，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业界对于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没有提出任何质疑。特朗普对于世界经济的不甚了解并不意味着美中经济关系在利益上就一定是不对称的。双方可能需要对政策的许多方面进行相应调整，我们日志里的“100日计划”就是一个好的开端，但它能否为两国带来长期的利益仍是问题。朝鲜可能对中美及东亚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造成一定的影响，短期来看，特朗普可能更多地根据常识来制定政策。据报道，上一次峰会时习近平曾有机会向特朗普解释中国和朝鲜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是件好事，沟通还是需要的。这里我就先跳过。

就朝鲜而言，我们不应忽视平壤政策的危险性，朝鲜若有能力将核弹打到美国本土之上，就一定会对本地区现状造成极大影响。华盛顿将会为首尔和东京提供安全上的保障，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参与者都应该承担起责任以解决这样的问题，至少是出现问题的可能性。我认为美国政府对平壤发出的一些警告的确有些反应过度，现在情况有所缓和。美国会更为谨慎地行动，但是关键问题在于朝鲜坚持获得核武器的意愿非常危险，尽管大家都在努力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但朝鲜不愿做出改变。

到现在为止我得出两条结论。第一是在特朗普政府中，政策制定的过程和政策内容本身是一样重要的，因为好的政策制定流程才能确保好的政策内容，而不是相反。政府制度化机构的政策制定方式，和特朗普特立独行的直率风格之间的紧张关系仍会长期存在。第二点是特朗普政府的亚洲

政策显然还是会回到前一届政府的标准做法，也就是“综合前沿军事力量部署”。这一政策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也是为了整片区域中所有国家的和平稳定，当然也包括中国。我们的目标并不是遏制中国，而是为地区和平稳定不断地调整方向。我不能保证我们将来能够取得和之前一样的成功，但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谈到，我们将会向减少不稳定因素的方向努力，我们希望他能够说到做到。

最后我想提一个更加宏观的问题，它不一定和亚洲直接相关，但是很有可能对亚洲产生深远影响。我认为美国的“综合前沿军事力量部署”可以实现，因为美国在二战中形成了国家力量的强大支柱，并且持续了至少二十年。这些支柱来源于过去半个世纪的技术进步和政治改革，主要包括：一个具有高度生产力的强劲经济体，最终这样的经济体会被第二个因素支持，也就是一个公开、平等的财政货币政策，第三是运作灵活的行政体系，以调节资本主义经济体，同时还有能够调动人力资源的教育系统、国家资助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持，当然还包括法治建设、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科学制度和生产能力建设，以及对财富和政治之间关系的制度制约。

我认为美国在过去的30-40年中，任由许多国家力量的支柱不断衰退。对于这样的一种衰退，我们可以从很多不同的方面加以解释，但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许多保守势力正在掀起一场针对累进税制的战争，对于他们来说减税比保持美国的竞争力更为重要。这些力量已经占据政治体系中的许多部门，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讲，特朗普只是一场更为大型的战争的征兆。这些力量的重组和角逐夺去了政府的资源，使政府无力保证国家实力不会衰落。

在我看来，美国在东亚地区的角色重要性会下降，不是由于资源的匮乏，而是由于意愿的缺失，或者更糟糕的，是由于自己造成的创伤。我希望我是错的，我希望我刚才做出的判断都是错的，尤其是对于东亚的判断和对于美国未来发展的判断。但是我不能够否认这些事情成真可能性，大家也只能去适应它。

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未经演讲者本人审阅）

# 中非经济纽带：发展新动力

Arkebe Oqubay Metiku 埃塞俄比亚总理特别顾问

首先我想衷心地感谢上海论坛的组委会，感谢你们搭建一个平台，为亚洲和世界对话提供机会。我很高兴 2017 年上海论坛能够把非洲这样一个内容放进去，而且我也希望它能够在未来几年成为一个惯常的做法。我要感谢韩国高等教育财团、感谢复旦发展研究院给我这样的机会在这里发表自己的观点。我还要感谢所有的演讲嘉宾，他们的观点非常精彩。

我非常希望就中国和非洲之间的经济发展做一个交流。我们都知道现在关于这一重要议题有两种视角。第一个我们把它称做欧洲为中心的角度，中非之间的贸易可能被很多人认为是新的殖民主义；第二个是从非洲角度，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建立起的非中关系将会继续推动非洲经济转型，最后为中国和非洲带来双赢，同时能够使全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我希望就这样的观点对立和问题进行讨论。

我的发言主要是三个部分，第一个是有关进一步发掘中非之间在更大的框架下展开的合作。我还将介绍该如何确保我们的合作活跃性，以及现在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在第二部分，我将向大家展示，为什么埃塞俄比亚是中非合作的典范，作为进入非洲门户，并已经取得经济转型的成果的中国与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合作，能够成为中非之间很好的合作连接纽带。第三部分我会谈一下 21 世纪中非合作未来，以及这样的合作如何实现可持续高效的发展，不仅造福中国和非洲，也造福全世界。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中非合作是在全球经济出现停滞的背景下得到了大家的高度重视，尤其是 2007 年、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逐渐认识到，其实我们生活的世界特别强调互联互通，一个地方所发生的问题和灾难一定在很短时间内迅速传递到其他地方，通过这种传导机制深刻广泛地影响着其他的国家和地区民生和所谓的行业发展。所以在这样高度互联的世界当中，我们现在建立起的优势，也一定会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正面激励作用。

第二个因素就是全球化问题，它使亿万人逐渐摆脱贫困，而且几千万人也因此走上了富裕之路。但是我们必须了解到全球化的负面作用，就是在不断地加剧两极分化。一些地区所享受到的财富并没有为其他地方平等享受到，因此我们觉得重点在于如何来减少，或者说来克服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通过加强合作来实现仁厚的脱贫。

我们需要明白的第三点是，中国在脱贫事业上已经做出了表率。中国的减贫运动轰轰烈烈，帮助 7 亿人口摆脱了贫困，也向我们证明了一个国家是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迎头赶上的。我们所知的一些先驱，包括

美国和日本，花费了更长的时间才取得这样的发展。而且中国也是一个制造业大国，贡献了全球生产制造的 25%，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对于非洲的发展和中非合作的未来影响巨大。

虽然非洲很多地方的发展不尽如人意，但是我们取得的进步也值得大家关注。我们的大陆差不多有 12 亿人口，占据世界的六分之一，到 2050 年我们整个非洲大陆人口将达到 20 亿，这是一个难以让人忽略的规模。非洲大陆同时也是让人可以看到未来和希望的地方，因为我们有非常强大的劳动力市场，也有一支在不断崛起的中产阶级，就像中国一样。同样我们都知道在很多国家，内乱、战争正在逐渐平息，尤其是过去几十年当中，非洲正在走向稳定与和平。而且不同国家也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增长，过去十五年中非洲 GDP 的年均增长达到 5%。

在这样的背景当中，中非的经济纽带基于两大支柱联结起来。第一个支柱是“一带一路”的政策倡议，这一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3 年所提出来的倡议正在造福我们非洲，海上丝绸之路大家都非常熟悉。对于中非来说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支柱则是中非合作论坛，2015 年已经在约翰内斯堡召开了第六次会议。自从这样的中非合作平台搭建之后，我们已经看到它极其有效地推进中非在许多行业当中的交往与合作，实现了持续发展。

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具体的数据。为了更好地评估这种合作的有效性，我们首先要看一下贸易，基础设施的开发，以及投资。就贸易而言，1980 年的时候，中非之间的贸易额只有 10 亿美元，但是在 2000 年已经达到了 100 亿，2013 年已经达到了 2250 亿美元，每年增长 21%。在中非合作论坛建立的 2000 年到 2013 年之间，中非之间的双边贸易增长了 20 倍，现在中国已经成了非洲大陆的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这是非常值得大家重视的一个成就。但是与此同时，有很多不平衡性，比如说中非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5%，却占非洲的 16%，所以贸易额有非常大的差异。非洲出口的主要产品是未经过加工的石油和矿产，长远来讲不利于非洲大陆的发展。从总量来讲，我们希望进一步提升，同时出口的产品结构相对比较单一，需要更加多元化，并且提高附加值，这个将成为我们未来中非合作贸易的重要发展方向。但目前的成果依然值得肯定，如果你看一下总量，非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是印度，印非之间的贸易额只有 600 亿美元，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贸易额差距达到了 1200 亿美元。

接下来看一下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必须认识到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减贫的作用十分显著，能够有效减少贫富之间的差距，如果要建立起一个有竞争力和活力的经济体，我们必须建设更多的基础设施。如果你对比一下中国和印度两大国家，最大的差异之一就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差异将会对经济体本身的竞争力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基础设施方面，中国的确对非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中国是非洲许多基础设施的融资

方，同时也是最大的合同承包商，这样的基础设施增量，将会深刻地影响到非洲经济的方方面面。

第三就投资方面而言，从中国流入非洲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在过去 20 年当中迅速增长，2014 年已经达到了第四位，仅次于英国、美国 and 法国。根据最近的麦肯锡调研，到 2020 年，中国将成为非洲 FDI 的第一大直接来源国。

即使是这样，我们仍然看到许多非洲国家，他们在中非合作中处于非常严重的不平衡状态。我们埃塞俄比亚一直在积极地和中国开展各方面的合作，应该说是整个非洲大陆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埃塞俄比亚和中国在多领域当中实现了合作，很关键的一部分是来自于中国的 FDI 流入，主要是集中在生产制造业，中国流入埃塞俄比亚的 FDI 中有 66% 集中在生产制造业，而在其他的非洲国家只在 25%-30% 之间，由此可见埃塞俄比亚在整个经济转型过程当中和中国之间有着互相依存的关系，而且能够更好地起到典范、示范的作用。基础设施是埃塞俄比亚非常重视的建设领域，我们从自己的资源当中已经拿出几十亿美元做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道路、桥梁、交通等等设施，我们也在不断地加强大学和技术学校建设，而最近我们工作的重点是工业园区的建设。关键在于非洲可以从中国和相应国家的合作中获得相应的收益，为此需要把经济转型提上议程，并且确保合作双方的积极参与。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和埃塞俄比亚的合作涵盖了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到吉布提的铁路的建设，它是一条电气化铁路，有 120 公里长，是整个非洲大陆最现代化的铁路之一。就能源而言，我们现在主要关注的是清洁和可再生能源，包括水电和风电，这对埃塞俄比亚发展非常重要。就基础设施的项目而言，我们主要关注的是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我们鼓励中国公司按时完成工程项目，实现效益最大化。在埃塞俄比亚我们的基础设施工程往往完成得很快，公园九个月就能建完，铁路只需要三四年的时间就可以造好。埃塞俄比亚航空是世界上位居前列的航空公司之一，致力于在中国和非洲之间建立起空中的联系，很多中国公民都会搭乘埃塞俄比亚航空，它已经成为双方交流的重要桥梁，也使埃塞俄比亚成为重要的航空枢纽。我相信这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

最后我想总结三点，首先，为了中非能够进一步共享发展，所有的非洲国家都应该积极地关注经济转型，从单一的产业转型为多元的产业。随着油价的下跌，很多非洲产油国因为经济多元化的不足，受损非常惨重，所以经济转型必须提上议程。第二，我们不能简单把中国看成资源的来源。欧洲银行、世界银行等等机构都为埃塞俄比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对我们来说非洲的国家应该把中国也作为一个学习政策的对象国。中国将数亿人从贫困的状态当中拯救出来，非洲应该在这方面向中国学习。中国有很多政策值得非洲来学习，比如说所谓的政策试点，是一个非常好的执行政策

的方式。实事求是也是中国的法宝，产业政策方面可学的也很多。我们相信这种政策的学习，应该是非洲国家认真考虑的方面。本土的人才发展、管理人才的开发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支柱是我们必须基于价值和原则开展合作。我们看到过非洲一直受到殖民国的压迫和剥削，而中非关系建立在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之上，同时也是建立在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前提之上，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们说中非合作不是新殖民主义的原因。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其他的一些国家，提供援助的时候都有很多条件。非洲国家应该拒绝这些外部势力对于非洲内部事务的干预，人权和民主是每个国家内生的，而不是从其他国家移植过来的，所以我们要基于联合国宪章的核心价值和原则开展合作。和平共处、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对方的内政是联合国宪章的关键原则，中国应该继续秉承这些理念，在G20峰会等国际平台上推广这些价值。

我们同时相信这些合作会帮助欧洲以及其他发达国家。欧洲最大的问题就是移民，如果在非洲有足够的就业机会，如果非洲经济活力得以提升的话，我们就能够控制住这些移民。因此，这样的合作与发展有利于遏制打击恐怖主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帮助世界各地的穷人改善境遇。以上是我们在进一步推动中非合作过程当中需要考虑的一些重要因素。这些合作也会增进世界的繁荣发展。在21世纪，非洲致力于让世界看到非洲更好的发展，谢谢。

（本文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未经演讲者本人审阅）



# 《中国观》2017年长期征稿启事

为更好地落实新型智库建设，推动科学研究与决策咨询的相互转化，提供更多高质量、高水平的咨询报告与专家建议，复旦发展研究院和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拟就《中国观》向国内外学者长期征稿。《中国观》以中国当下各领域的热点议题为关注重点，每月月刊以“国际视角 前沿观点 中国智库 建言发展”为主题，选编国外顶尖智库最新中国研究成果，并且收录复旦发展研究院访问学者、国内智库专家对当前中国热点问题的政策分析。

## 一、征稿要求

1、政策分析或建议，对前瞻性、综合性问题有深度思考，选题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中国内政、外交、经济、社会、教育等与中国发展密切相关的领域。

2、英文版：可推荐国外智库或主流媒体发表的英文稿件（如为其他种类语言，请附上200字左右文章概述），亦可投送本人英文研究成果，经编辑部确定用稿后，由荐稿单位或个人组织翻译，或由编辑部统一翻译。

3、中文版：（1）各单位或个人可向编辑部投送稿件，选题自拟，语言精练、平实，避免学术化，字数3000字左右，文末附100字以内的作者简介；（2）如稿件涉及重大敏感问题，请勿用电子邮件直接发送，将文稿刻录光盘同纸质文本一并寄送至编辑部。

## 二、投稿须知

1、投稿邮箱为：[thinktank@fudan.edu.cn](mailto:thinktank@fudan.edu.cn)，投稿时邮件主题处填写稿件标题，在文末附上以下内容（个人信息十分重要，要求准确无误）：文章标题、作者姓名、荐稿人姓名（或单位名称）、邮寄联系方式、电子邮件、电话号码。

2、一次一稿，请勿一次多稿或重复投稿。

3、允许稿件向其他刊物或渠道投送，录用意见一月内给出。一旦录用，编辑部会给予适当奖励。

##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黄昊，王柯力

联系电话：021-55665596

电子邮件：[thinktank@fudan.edu.cn](mailto:thinktank@fudan.edu.cn)

寄送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智库楼211室

邮编：200433



## 复旦发展研究院

复旦发展研究院成立于1993年2月12日，对外立足于一流智库的建设，为国家和上海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复旦的思想与智慧，成为国家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对内立足于学科的交叉与整合，研究团队的建设与发展，以国家需求推动学科整合，以学科整合贡献国家发展，提升复旦大学在国家建设与进步中的地位与影响。复旦发展研究院所孵化和培育的研究机构包括7个国内中心，即：金融研究中心、金砖国家研究中心、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传播与国家治理中心、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社会科学数据研究中心、中国保险与社会安全研究中心；3个海外中心，包括：复旦-UC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复旦-欧洲中国研究中心（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复旦-墨西哥中心（墨西哥蒙特雷技术大学）；1个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家俱乐部，2个大型论坛秘书处，分别为中国大学智库论坛秘书处与上海论坛组委会秘书处。



## 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

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在上海市教委领导下，依托复旦大学，致力于培育和提升上海高校智库建设的能力和水平，构建国内有地位、国际有影响的上海高校智库体系，以服务出管理、以内部交流出整合、以国际对话出影响、以评估出质量、以贡献出地位，搭建立足上海、服务全国和放眼世界的交流平台、推介平台和国际对话平台。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聚合上海高校的学术和智库资源，转化智库研究成果，为国家和政府建言献策；通过媒体向大众推介智库思想，实现学术成果的社会价值；培育有咨政能力的复合型优秀学者，推动高校学科建设，促进新型特色高校智库发展。

中国的角度

世界的维度

专业的深度

战略的高度

一般性声明：

\* 本刊仅供本刊编辑部呈送的特定对象阅读使用，不做任何商业用途。

\* 除明确提示的文章外，本刊其他文章基于已公开信息编译或选摘，但本刊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

\* 本刊所编译、选摘的文章，仅如实、客观反映原作者观点和立场，并不代表本刊编辑部的观点和立场。

\* 本刊属于内部资料，本刊编辑部对其保留一切权利。除非本刊编辑部事先书面授权，本刊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成任何形式的拷贝、复印件或复制品，或分发给特定阅读对象以外的人。

General Statement:

\* This publication is provided by the editorial team for use by specially designated persons only. It is not for sale or redistribution.

\* Unless otherwise noted, this publication's content is compiled, translated and edited from publicly available information. It does not guarantee the accuracy or completeness of said materials.

\* Views expressed in the articles here are the original authors' own and do not represent the views of the editorial team.

\* Material on these pages is for internal reference only. The editorial team reserves all rights. No portion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copied, altered in any way or transmitted to others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editorial team.